

布列斯特教会合并

张百春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00)

[摘要] 1596年,在当时属于波兰共和国的布列斯特召开了东正教和天主教会联合的宗教会议,史称“布列斯特教会合并会议”。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东正教和天主教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至今在双方关系中仍然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关键词] 东正教;天主教;教会合并

[中图分类号] K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05)05-0101-06

作为统一的国家,基辅罗斯形成于公元9世纪。在经历了短暂的鼎盛时期后,基辅罗斯开始衰落,分裂为诸多公国。王公间内讧不断,民不聊生。基辅逐渐丧失了其作为罗斯政治中心的地位。取而代之形成了两个中心,即南方的加利西-沃伦公国和北方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公国。1237—1240年,蒙古鞑靼人入侵俄国,结束混乱局面,开始了对俄国长达240年的统治。在此期间,俄国的政治中心逐渐从南方转向北方。在蒙古人统治被推翻前夕,莫斯科取代了弗拉基米尔而成为俄国的政治中心。

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俄国西部邻居乘机掠夺领土。在这方面,立陶宛成就最大。14世纪,立陶宛占领了俄国西部大片的领土,连基辅也未能幸免。除加利西被波兰占领外,整个乌克兰都被纳入立陶宛的版图。1368年,波兰和立陶宛两国通过王室间的联姻而合并。然而,通过联姻的方式联合起来的国家一直不十分稳定。直到1569年的“卢布林合并”后,才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波兰共和国。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受到俄罗斯东正教影响很大的立陶宛民族开始天主教化。

波兰和立陶宛有许多领土是从俄国夺来的,其上居住着俄罗斯人,他们都是东正教徒。作为天主教国家,波兰当然不希望看到东正教在自己国土上发展。因此,随着天主教的推行,在波兰和立陶宛均发生了排挤东正教的现象。俄国的政治中心已经转移到北方,对西部领土鞭长莫及,而且俄国人自己还处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面对西部领土上的东正教徒兄弟的遭遇,心有余而力不足。

10世纪末,俄国人从拜占庭帝国引进东正教作为国教。由于这个历史渊源,俄国东正教会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是后者的一個都主教区。俄国都主教一般是由希腊人担任。长期以来,都主教驻地 在基辅,因此,俄国东正教会也叫基辅都主教区。随着俄国政治中心的转移,基辅都主教驻地也向北方 迁移。1299年,基辅都主教将驻地迁移到北方的弗拉基米尔。1328年,基辅都主教最后落户莫斯科,俄 国东正教会由基辅都主教区变成了莫斯科都主教区。伴随着莫斯科的崛起,蒙古人对俄国的统治走向 终结。此时的拜占庭帝国也在走向衰落。在政治上已经走向独立的俄国人开始寻求摆脱对君士坦丁堡 牧首区的依赖。

莫斯科都主教区走向独立与希腊人在佛罗伦萨教会合并会议(1438—1439)上的表现有关。面对土

[收稿日期] 2005-07-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1BZJ010)

[作者简介] 张百春(1965-),男,黑龙江依安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哲学博士。

土耳其人的威胁，为了获得西方天主教世界的军事援助，希腊人在这次会议上与天主教徒联合，即承认天主教教义，服从罗马教皇的领导，但保留自己的礼拜仪式。希腊籍基辅都主教（实际上已经是莫斯科都主教了）伊西多尔代表俄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积极支持教会联合。俄国人反对一切形式的教会联合，因此不承认佛罗伦萨会议。伊西多尔返回俄国后被逮捕，但他成功地逃跑了，最后去了罗马。1448年，在伊西多尔逃跑后，俄国人未经希腊人同意，独立地将约纳祝圣为莫斯科都主教。莫斯科都主教区彻底独立。

就在莫斯科都主教区独立十年后，基辅都主教区从莫斯科都主教区中分离出去了。当年伊西多尔逃跑时，带走一个学生格列高利，后者于1458年被支持教会联合的君士坦丁堡牧首马马祝圣为第一任独立的俄国西部都主教，这位牧首当时正流亡在罗马。从此，统一的俄国教会分裂了，形成两个都主教区，各有自己的都主教。一个以基辅为中心，仍然叫基辅都主教区，另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叫莫斯科都主教区。如果说莫斯科都主教区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后实行了完全的自治，那么基辅都主教区独立于莫斯科都主教区后，仍然服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领导，尽管这个领导十分勉强。

独立后的第一任基辅都主教格列高利是佛罗伦萨教会合并的支持者，他多次果断地在立陶宛推行合并教会，但没有获得国王的支持，信徒更是坚决反对。大约十年后，他自己回到了东正教的怀抱。不过，在他之后的最初几任西部都主教几乎都坚持教会合并政策。最后一位与罗马保持联合关系的基辅都主教是约瑟夫·布尔加林（1498—1501年在位）。从16世纪初开始，在下层信徒的强烈抵制之下，合并教会逐渐消失，没有人再公开支持和宣传教会合并的思想了。

俄国西部教会回到了东正教的怀抱，名义上还是由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管辖，但这个隶属关系只是形式上的。实际上，在波兰共和国领土上的东正教徒根本得不到来自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保护。他们被迫孤军奋战，抗击来自各方面的打击和迫害。在这种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教会合并的思想始终存在于部分人的头脑中。

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都是天主教徒，他们不可能真心诚意地保卫东正教徒，相反，利用各种机会排挤和迫害东正教徒，想尽办法削弱东正教在自己国家的力量。在1413年通过的戈罗杰里决议（*Акта о вѣроисповѣданіи в Литовіи*）中就明确规定，在立陶宛，高级国家职务只能由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人担任。决议还禁止再建东正教堂，甚至禁止修缮已有的东正教堂^[1]（P539）。这个政策极大地伤害了东正教徒，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天主教徒以各种借口剥夺东正教堂。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之间冲突不断。

就在“卢布林会议”最后一天，波兰国王西基兹蒙德二世说：“政治合并在大会上通过了，我现在要考虑的是信仰上的统一问题，这是宗教上的统一，即统一的罗马教会的统治地位问题。”^[1]（P590）国王的意图是明显的，就是要削弱东正教在波兰共和国的力量，最终用天主教取而代之。对东正教徒而言，这是一个不幸的宣言，它改变了波兰共和国领土上东正教徒的命运。尽管波兰共和国是欧洲当时在信仰方面比较宽容的国家之一，但是东正教徒在这里还是遭到歧视和排挤，他们被看作是二等公民，波兰作家甚至称之为“分裂派”^①。此外，波兰国王一直担心莫斯科对立陶宛领土的威胁，总是寻找各种机会使立陶宛彻底地与莫斯科断绝联系。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手段当然是宗教上的分离，即让立陶宛领土上的东正教徒脱离东正教会，处在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之下。这就为实现教会合并提供了政治基础。

在基督教国家，世俗政权为教会提供庇护，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信徒的宗教生活，这就是所谓的庇护制。在政教关系上，这是个很正常的制度，自古有之。国王或贵族等土地占有者保护自己领地上的信徒和教会，控制教会神职人员的人选。比如作为东正教徒的俄国沙皇是东正教的捍卫者，为东正教徒提供各种庇护。但是，在波兰和立陶宛以及后来联合的波兰共和国，这个制度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在这里，国王和政府官员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只为天主教提供庇护。波兰天主教贵族更是利用这个庇护制，暗中破坏东正教，排挤东正教徒。东正教的主教任免完全由国王决定。国王根本不考虑宗教因素，只根据自己的愿望，只考虑候选人对国王的忠诚和对国家的贡献，而不是其在信仰上的虔诚。因此，东正教主教职位实际上成了国王与主教之间的一种交易。上行下效，波兰贵族完全控制着自己领地上的东正

① “分裂派”（*аѣщѣ окѣ*）在这里是个贬义词，意思是脱离正统基督教的信徒，他们甚至不再被看作是基督徒。

教会生活,无论东正教修道院院长,还是堂区神父,其命运都掌握在贵族手中。如果贵族是个东正教徒,情况还好些。如果是天主教贵族,那么他们总是滥用这个权利,把这些重要的教会职位“赏赐”给自己喜欢的人。

俄国西部领土上的东正教会最大的问题出现在主教人选上。国王根据自己的考虑,随意任免东正教的主教,有时干脆将主教职位卖掉,甚至同时卖给两个人,他们之间再通过武力解决这个主教职位的最终归属。至于在这个过程中行贿受贿现象,更是随处可见。更有甚者,国王常常根据天主教徒的意愿任免东正教的主教。因此,那些根本不适合担任任何宗教职位的人,却当上了东正教主教。“成为主教后,他们仍然与自己的妻子居住在一起,将修道院的一部分或全部改为生活区,在这里举行舞会和宴会。”^[2]通过这种途径获得主教职位的人,不但不适合履行宗教职务,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些道德败坏分子。许多东正教主教过着奢华和堕落的生活,影响极坏。显然,这是作为天主教徒的国王和贵族有意为之,其目的是为了贬低东正教。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因为逐渐地,俄国西部东正教会内部很少有合格的教牧人员了。本应为信徒树立道德榜样的神职人员,恰恰在道德上堕落了。可以说,波兰共和国东正教神职人员道德堕落是合并教会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1](P614)。

在波兰共和国,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关系始终非常紧张,而且常常是敌对的。天主教徒敌视东正教徒,甚至不希望看到东正教徒在波兰共和国存在。因此他们想方设法排挤东正教徒,通过各种手段把东正教徒引向教会联合。在这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的是耶稣会士,正是他们使合并教会的思想在这里复活了。耶稣会士的出现,对西部东正教会的处境而言,可谓是雪上加霜。

耶稣会士被邀请到波兰共和国,主要是为了抵抗新教在这里的流行。耶稣会士成功地控制了波兰共和国的教育系统,将在这个领域里曾经取得巨大成功的新教徒压制下去。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放过东正教,对东正教徒展开了宣传攻势。耶稣会士彼得·斯卡尔卡(Пётр Скалка)于1577年用波兰语出版了一本流传很广的宣传教会合并思想的小册子《论上帝教会如何团结在一个牧人周围》,并把它献给了当地最富有的东正教贵族康·康·奥斯特罗日斯基公爵(Константин Острожский)。作者在书中描绘了罗马天主教会是如何地成功,而希腊东正教会则被描绘得十分可怜。结论是,东正教徒应该回到罗马天主教会的怀抱,即走合并教会之路。作者在书里提出了具体的联合计划。尽管这个计划并没有什么新内容,没有超出佛罗伦萨合并会议,但它十分具体:只要俄国东正教徒承认教皇的首要地位,承认罗马教会的所有教义,他们就可以成为合并派教徒,至于希腊的宗教礼仪(或者俄罗斯的宗教礼仪),如果它们不违反罗马的信仰,则可以完全保留下来。这对处在困境中的东正教徒(特别是白俄罗斯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当地贵族中间引起广泛关注。

582年,耶稣会士安东尼·波塞文诺神父去莫斯科调节俄国与波兰之间的战争。在莫斯科,他与伊万雷帝就信仰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伊万雷帝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结果波塞文诺神父空手而归。但他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莫斯科与天主教会联合是无法直接实现的。因此当他回到立陶宛后,改变了自己的主意,那就是先使立陶宛罗斯与罗马天主教会联合,然后通过这个联合再将莫斯科罗斯与罗马天主教会联合。波塞文诺神父在波兰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中间广泛宣传这个思想。

基辅都主教区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但牧首对这个教区的管理实在太弱了。因此,在波兰共和国,能够对东正教徒起到保卫作用的只有东正教贵族。面对东正教会的可怜状况,东正教贵族们也在积极寻找出路,其中有人认为,东正教与天主教联合可以改变东正教在波兰共和国命运。东正教贵族奥斯特罗日斯基公爵就坚持这个想法。但他当初所设想的教会合并不是向天主教会的妥协,而是双方都需要的、在平等的基础上所实现的联合。在他看来,这种联合不能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而且整个东方教会都应该参与这种联合。当然,这是个十分理想化的方案,至少在当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但公爵的愿望是良好的,就是要使波兰共和国的东正教徒摆脱受排挤的状态。16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奥斯特罗日斯基公爵就教会合并问题积极地与天主教会和波兰政府磋商。他曾就这个问题与国王谈过,与教皇使节交流过意见,多次与耶稣会士波塞文诺神父讨论。

东正教徒在波兰共和国遭到来自天主教和新教两方面的排挤,处境极其艰难。这里的东正教主教和神职人员不但没有捍卫东正教,没有帮助自己的教民摆脱困境,相反,他们却因自己的道德堕落而动摇了东正教会的根基,扰乱了教会生活的正常秩序。神职人员与信徒之间相互指责,矛盾激化。比如,

主教指责信徒无知、信仰不虔诚；平信徒则说主教和宗教界都是些放荡的人，肆意侵吞教会财产。信徒揭露主教们道德的堕落（如犯重婚罪的主教仍然主持礼拜仪式）。平信徒已不再信任自己的主教，为了保卫东正教，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各类宗教团体。1572—1580年间，在奥斯特罗日斯基公爵的领地上，如卢茨克、图洛夫、弗拉基米尔等城市成立了许多宗教团体。1584年在维尔诺成立的宗教团体影响最大。到17世纪初，几乎每个教堂和修道院都有一个宗教团体。起初，宗教团体只是收集奉献，后来逐渐地开始干预自己教区内部的宗教生活，决定教区内部的一些重要问题。宗教团体与主教们之间的冲突已经公开化，其尖锐程度从宗教团体的章程中可见一斑：“如果主教违法教规，不按照使徒和教父的规范领导教堂，那么所有的人都应该反对这个主教，把他当作这里的敌人。”这个规定表明，平信徒可以监督主教的行为，主教的权力受到了限制。

波兰共和国的东正教主教不但由国王和贵族摆布，而且还要受自己教民的限制。政府和教民成了主教们的包袱。作为东正教的最高管理者，主教们既得不到政府的庇护，也得不到教徒的信赖。君士坦丁堡牧首完全站在了教民的一边。因此，东正教主教们陷入到十分尴尬的境地。耶稣会士再一次轻松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宣传天主教，这次的对象是东正教主教。耶稣会士支持主教们反对宗教团体，反对东方教会的牧首，把牧首贬低成苏丹的奴仆。他们还向东正教的主教们展示了天主教主教的辉煌地位，天主教信徒不但绝对服从主教，而且有许多主教在议会里任职，地位显赫，有权有势。这一切非常令东正教主教们羡慕，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宗教团体的章程和活动获得了东方各教会牧首的支持。因为东方牧首们也意识到从俄国分离出去的西部领土上的东正教徒所面临的严重威胁，他们开始关注这块土地，加强对这里东正教徒生活的监督和监护。君士坦丁堡牧首叶列米亚（Аѳѳанъ）二世于1588年去莫斯科，将都主教约夫提升为牧首。在返回的路上，叶列米亚二世经过立陶宛。他积极支持这里的宗教团体的活动，对宗教团体的章程给予认可，对宗教团体成员在维护东正教纯洁性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予肯定，并以公文的形式正式赋予宗教团体以独立于主教的权利。

叶列米亚二世到立陶宛来决心整顿这里的东正教会的秩序。正是叶列米亚二世的一系列措施促使基辅都主教区的主教们行动起来。在牧首离开不久，他们就决定每年的6月份在布列斯特召开宗教会议，商讨和解决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教会合并思想在这里悄然复活了。第一次宗教会议于1590年6月20日在布列斯特召开，主教们在会上探讨了东正教在波兰共和国遭受打击和迫害的状况，基本上取得共识，即认为问题出在东正教会内部，应该从根本上解决教会内部的问题。有四位主教决定采取极端措施，暗中进行一场阴谋。他们秘密地签署一份文件，其核心内容是承认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威，与天主教会联合，但要求保留东正教会的礼拜仪式。这四位主教是：卢茨克主教基里尔·捷尔列茨基、利沃夫主教格杰翁·博洛班、平斯克主教列昂季·佩利钦斯基和霍尔姆斯克主教季奥尼斯·兹比鲁伊斯基。都主教米哈伊尔没有签字。他不知道有这个文件，还是他故意没有签字，不得而知，另外两位主教没有出席会议。签署文件的四位主教各有难言之苦，格杰翁·博洛班正与利沃夫宗教团体闹得不可开交，他更多地出于愤怒而走上了这条路，其他三位主教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担心遭遇前都主教奥西福尔·杰沃奇卡的命运，因此提前下手。平斯克主教列昂季和霍尔姆斯克主教季奥尼斯都是结过婚的人，宗教团体控告他们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对东正教主教位置来说，这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主教们没有公开宣传教会合并思想，特别是不敢在东正教徒面前流露这个意思，因为这会激化信徒与他们之间的矛盾。波兰共和国国王西基兹蒙德三世（1587—1632年在位）起初没有立即公开表达自己对待教会合并的意见，因为他担心这样会得罪东正教徒，其尚未稳定的政权还需要广大东正教徒的支持。1592年，国王才开始公开支持教会合并，并许诺给予教会合并的主谋们以保护，赋予合并后的东正教主教与天主教主教以同等的政治地位。1594年，在基里尔·捷尔列茨基主教的倡议下，格杰翁主教、季奥尼斯主教和佩列梅什利主教米哈伊尔来到了索卡利（Аѳѳанъ）秘密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一个文件，制定了教会合并的条款。在合并教会的历史上，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兹引用其核心部分如下：

“我们请求国王用法令保卫我们及我们的主教区，永久确立以下条款：

1. 保证永远不破坏我们教会的任何礼仪和仪式；
2. 保证俄罗斯主教教堂、修道院及其财产不受侵害，根据老传统，整个宗教界应该处在主教们的管

理、祝圣和牧养之下；

3. 保证所有教会事务和礼拜不受任何人的干涉，无论是宗教界，还是世俗人士，一切宗教活动均按旧历进行；

4. 希望国王恩准我们进入议会，允许我们在拉达(参议院)里有自己的席位；

5. 保证可能来自(君士坦丁堡)牧首对我们的诅咒既不伤害我们，也不伤害我们的宗教界；

6. 保证来自希腊的修士不再对我们实行任何统治，他们到这里只是为了剥夺我们的财产，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称为间谍；

7. 取缔(东方)牧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我们这里赋予给宗教团体的委任书和特权，以及在平民中间为各种事务而赋予的委任书和特权，异端和教派就是因此而产生的；

8. 保证每个新当选的主教都由基辅都主教祝圣，而都主教则由所有的主教选举产生，然后获得教皇的恩准，但不再交纳任何费用；

9. 国王应该签署命令为我们确立所有这些条款，一份命令用拉丁文，另一份用俄文；

10. 国王应该协助争取罗马教皇恩准这些条款，国王应该保证我们享有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公国大主教、主教、高级僧侣和全体罗马神职人员一样的自由。”^[1](P636)

在基里尔·捷尔列茨基主教的劝说下，都主教米哈伊尔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字，并在补充了自己的意见之后，把这份文件递交给国王。在这些条款中，绝大多数涉及的是主教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教会的法规，更没有触及任何神学方面的问题。

在少数几位主教的积极活动下，教会合并的思想在其他主教之间逐渐获得了支持。到1594年底，几乎所有的主教都接受了这个思想^①。1595年9月14日，波兰国王向自己的国民宣布支持东正教徒与天主教会联合。随即基里尔和伊帕季两位主教受国王委托，带着庞大的随行队伍出发去了罗马。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1595年11月中旬他们来到了罗马。罗马教廷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同时梵蒂冈的专家们对基里尔和伊帕季两位主教带来的一系列文件进行认真研究，以便做出答复。1595年12月23日，教皇克莱门特八世(1591—1605年在位)和罗马高级主教们举行盛大仪式，正式接受了东正教徒的合并请求。基里尔和伊帕季主教跪在地上，亲吻教皇的靴子，表示臣服。伊帕季用拉丁文，基里尔用斯拉夫文宣读了信经，并在佛罗伦萨会议和托兰特会议的文件上签了字，表示承认这两次会议的决定。这两位主教完全承认教皇的绝对统治地位，表示愿意投入罗马的怀抱，唯一要求是保留自己东方的礼拜仪式。教皇欣然对他们说：“我不想统治你们，只想承担你们的重负。”^[1](P663)所有随行人员一一亲吻教皇的靴子后，仪式结束。

1596年1月21日，教皇克莱门特八世签署一份关于教会合并的文件，文件最后说：“依据本协议，我们接受尊敬的兄弟都主教米哈伊尔和其他俄罗斯主教以及全体教士和居住在波兰国王领土上的俄罗斯民族回到天主教会的怀抱，他们是在基督里的成员。为了见证我们对他们的爱，依据使徒的恩赐，我们允许他们(合并派信徒)在举行圣礼和其他神圣仪式时履行自己所有神圣礼仪，只要它们不违反天主教信仰的真理和信条，不妨碍与罗马教会的交往。”^[1](P663)

尽管在波兰共和国教会受国家控制，国王直接干预教会事务，但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合并问题毕竟是纯粹教会的事务，因此，应召开宗教会议，以通过在罗马签署的教会合并的一系列文件。国王主动建议都主教米哈伊尔在布列斯特召开宗教会议，并对参加会议的人员提出了要求，即以波兰天主教徒和已经同意转向罗马教会的东正教徒为主，那些不接受合并教会的东正教徒可以参加会议，但人数不能多，不能成群结队地进入会场，以免发生骚乱。都主教决定于1596年10月6日在布列斯特召开宗教会议。其实，这次会议是形式上的，因为一切都已经决定了。因此，会上不能有不同的意见。不支持教会合并的东正教徒的声音在会议上不能出现，否则会议就失去了意义，甚至会出现混乱。以奥斯特罗日斯基公爵为首的反对教会合并的东正教徒决定选派代表正式参加这次会议，以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

1596年10月6日早晨6点，天主教徒、合并派信徒和国王的代表秘密地聚集在布列斯特尼古拉教

① 只有波洛茨克主教纳法奈尔(士士士)还在犹豫，但这位行将就木的主教的意见对教会合并的进程已没有任何影响，他于1595年初去世。

堂开会,这是布列斯特主教大教堂,其他教堂都被布列斯特主教伊帕季给关闭了,以防反对教会合并的东正教徒自行举行会议。教会合并会议在当天就结束了全部工作,因为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只是表决通过教会合并的决议。会议决定接受基里尔和伊帕季两位主教在罗马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对放弃合并教会思想的两位主教进行了绝罚,即格杰翁主教和米哈伊尔主教,此外还绝罚了所有不接受合并教会的东正教神职人员。会议请求国王对遭到绝罚的神职人员予以撤职,让合并派信徒取而代之。

当反对教会合并的东正教徒得知无法进入尼古拉教堂参加会议后,立即决定单独召开自己的会议,地点选择在新教贵族赖斯基(бляжский)的私人住宅里,因为东正教堂都被关闭了。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奥斯特罗日斯基公爵,东方两个牧首代表(即君士坦丁堡牧首代表尼基福尔(Никифор),亚历山大牧首代表基里尔·卢卡利斯(Кирилл Лукацкий)),还有两位放弃教会合并思想的主教,其余为神父和平信徒代表。会议由君士坦丁堡牧首代表尼基福尔主持。根据东方教会传统,此次会议代表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由具有高级神职的人组成,另一部分是由堂区神职人员代表和世俗代表组成。与会者旗帜鲜明地反对教会合并,号召广大东正教信徒坚决抵抗教会合并,维护东正教的独立地位。会议一致认为,合并派主教们的行为是对东正教会的背叛,他们应该受到教会的严惩。此外,没有东方教会地方宗教会议的决定,合并派会议是无效的,这样的教会合并是不合教规的,对任何人都是没有约束力。会议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即对合并派主教进行了绝罚,也给国王去信要求对遭受绝罚的合并派主教予以撤职,让东正教神职人员取而代之。

这样,关于教会合并问题,同时进行两个会议,一个是以天主教徒、合并派信徒和耶稣会士为一方的赞成派,另一个是以奥斯特罗日斯基公爵为首的反党派。双方在会议期间曾经多次交涉,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两个宗教会议都在10月9日结束。教会合并完全符合波兰共和国国王的意愿,1596年10月15日,他宣布合并派合法,将受到国家的保护。反对派会议的一切要求都遭到国王的拒绝。接受教会合并的东正教徒按照波兰语被称为“合并派”(Аюкль),他们的教会被称为“合并派教会”(Аюкль а Гь ил);而没有接受教会合并的东正教徒则被称为“反合并派”(дль Аюкль 或 а Гь ил аюкль а Гь ил)。

1596年发生在波兰共和国的教会合并,标志着天主教对东正教的胜利。因为加入合并教会的东正教徒服从了罗马教皇,承认了天主教的教义,这是东正教会的最大失败。在国王和政府的支持下,合并教会在波兰共和国领土上开始推行,不接受合并教会的东正教徒遭到长期的和残酷的迫害。不过,合并派信徒的命运也是悲惨的。他们成了波兰和俄国各种冲突的焦点,成了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复杂关系的焦点。合并派问题至今还是改善罗马天主教会和俄国东正教会之间关系的最大障碍。

[参考文献]

- [1] [俄] 卡尔塔绍夫. 俄国教会史纲: 第1卷[M]. 莫斯科: 科学出版社, 1991.
- [2] [俄] 德·波斯别洛夫斯基. 罗斯、俄罗斯和苏联历史上的东正教会[M]. 莫斯科: 1996.

Brest Church Union

ZHANG Bai- chu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 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00, China)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ferences in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Brest Church Union, was held in 1596 in Brest, which belonged to Poland at that time. It is the union of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and Roman Catholic churches which drew significant inf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hurches and still has been playing a deciding part in the interrelationship nowaday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background, causation, and process of Brest Church Union

Key words: Brest Church Union,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Roman Catholicism

[责任编辑: 赵 红]